

谭桂林 朱晓进 杨洪承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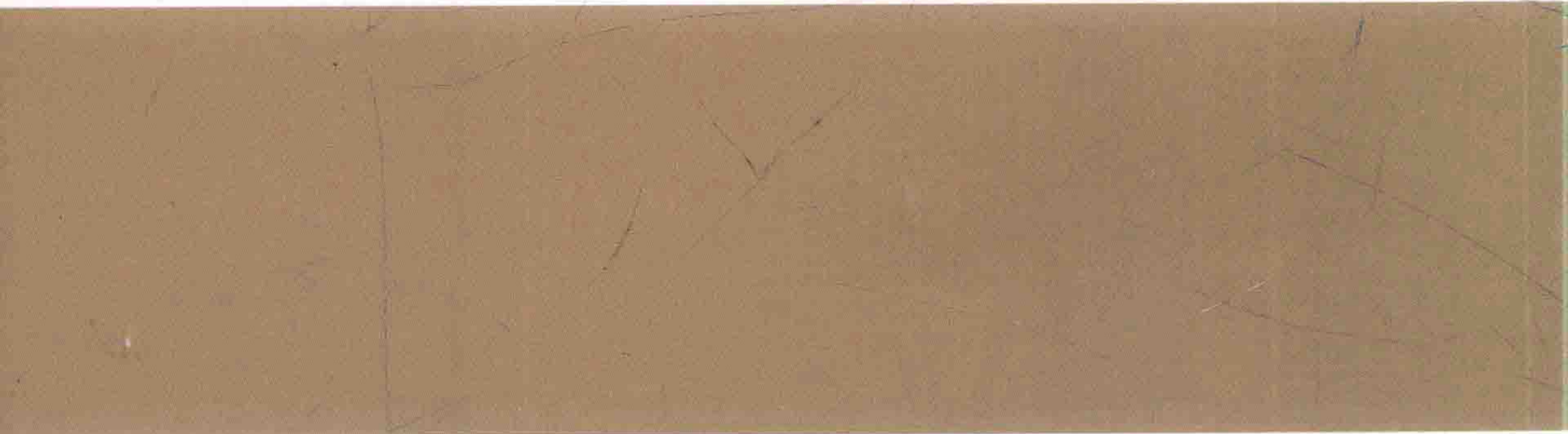
从南京走向世界

“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青年学术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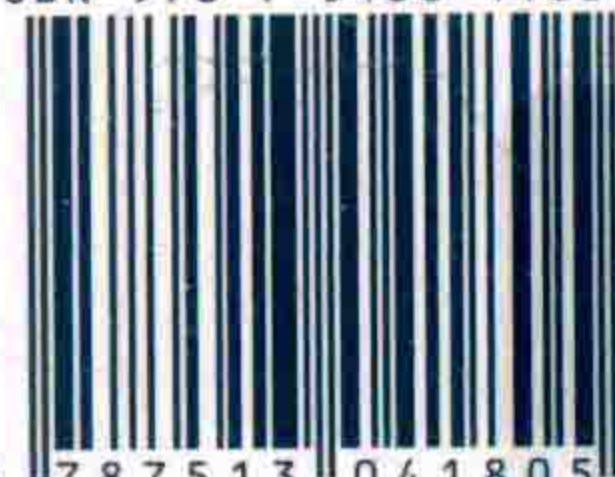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上架建议：文学

ISBN 978-7-5130-4180-5



9 787513 041805 >

ISBN 978-7-5130-4180-5

定价：58.00 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研究”资助



从南京走向世界

“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青年学术论坛

谭桂林 朱晓进 杨洪承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南京走向世界：“鲁迅与20世纪中国”青年学术论坛 / 谭桂林，
朱晓进，杨洪承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5

ISBN 978 - 7 - 5130 - 4180 - 5

I. ①从… II. ①谭… ②朱… ③杨… III. ①鲁迅著作研究—学术会议—
文集 IV. ①I210.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6887 号

责任编辑：文 茜

封面设计：SUN工作室

责任校对：董志英

责任出版：卢运霞

从南京走向世界：“鲁迅与20世纪中国”青年学术论坛

谭桂林 朱晓进 杨洪承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55号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42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1000mm 1/16

版 次：2016年5月第一版

字 数：415千字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编：100081

责编邮箱：wenqian@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25.25

印 次：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ISBN 978 - 7 - 5130 - 4180 - 5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从南京走向世界：鲁迅与20世纪中国”青年学术论坛会议合影

2015年9月25日-27日

中国·南京

嘉宾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目 录

“寂寞” “听将令” 和 “曲笔” ——《新青年》视野中的《狂人日记》	鲍国华 / 1
论鲁迅钞古碑与教育部职务之关系	陈 洁 / 8
论《阿Q正传》的电影改编	陈伟华 / 16
1912~1949：西方表现主义美术在中国 ——以鲁迅、陈师曾、黄忏华、刘海粟、倪貽德为中心..	崔云伟 / 36
女性、牺牲与现代中国的烈士文章 ——从鲁迅、秋瑾到丁玲	符杰祥 / 60
鲁迅书简的披露过程	葛 飞 / 79
与摩罗先生商榷有关鲁迅的“国民性”等问题	古大勇 / 91
近代的超克、漫长的20世纪与“竹内鲁迅”	韩 琛 / 106
从虚妄返归真实：鲁迅生命尽处的“梦与怒”	贾振勇 / 124
周作人的“镜像”与“另一个鲁迅” ——论1936年周作人对“鲁迅”的叙述	李 玮 / 151
鲁迅在上海沦陷时期文学中的投影	李相银 / 166
文宝峰的鲁迅传播与研究	梁海军 / 184
《〈故事新编〉论》导论：鲁迅的“文脉”及 《故事新编》的读法	刘春勇 / 197
论鲁迅小说中的“主义”与“问题”之争	刘长华 / 210



启蒙语境中“故事新编”的尝试、变奏与中断:

也论《补天》 龙永干 / 222

“鲁迅学术史”考辨 邱焕星 / 236

鲁迅与“失语者” 施 龙 / 248

从比较视野论鲁迅儿童观的先锋性 谈凤霞 / 261

论周作人附逆事件中的“鲁迅”因素

——从佚诗《襁衫吟》说起 唐东堰 / 283

鲁迅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谢 森 / 295

托洛茨基“太初为事”与鲁迅的文艺批评观 杨 姿 / 305

再说“看”与“被看”

——鲁迅、李翊云或围观的阴影 叶 子 / 323

知识、日常、身体的权力策略

——鲁迅对早期中国市民社会知识女性命运的探讨 张 娟 / 332

越轨的都会之恶:《阿金》的挑战 张 克 / 344

鲁迅留日时期的历史观 张 勇 / 357

剑指国民性:重读《死后》 朱崇科 / 372

从绍兴到南京:文化场域的转换与

青年鲁迅的“书剑”人格建构 卓光平 / 384

后 记 / 397

“寂寞” “听将令” 和 “曲笔”^{*}

——《新青年》视野中的《狂人日记》

天津师范大学 鲍国华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鲁迅在“寂寞”的心境下，听《新青年》诸君之“将令”的产物，而且为响应“主将”的积极态度，在创作中不恤用了“曲笔”。“寂寞”“听将令”和“曲笔”由此成为理解这篇小說的三个关键词。《狂人日记》“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均与《新青年》的办刊宗旨、思想倾向和表达方式有着重要的关联。将小说置于《新青年》的视野之中，才能更有效地考察鲁迅的文体选择。

—

1922年12月3日，鲁迅为即将出版的自家第一部小说集作序。这篇题为《呐喊·自序》的文字，因涉及鲁迅小说创作之缘起，及其由教育部官员周树人到新文学大家鲁迅的华丽转身，日后成为研究其小说最常被征引的文献之一；更因文中的部分叙述，与鲁迅的其他文章略有抵牾（如“幻灯片事件”之于《藤野先生》），而成为考察其从事文学活动的心理症候——“原初的激情”——的重要依据。^①不过，尽管同属于“出山记”之类的自述性

* 本文原刊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① 周蕾从影像学视角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参见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38页。

文字，《呐喊·自序》却不似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洋溢着成功者的自信与满足，而是和鲁迅的大部分作品一样，曲径幽深，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是“寂寞”。“寂寞”一词在全文中出现凡10次，其中仅有2次用于形容“文学革命”初期求其友声的《新青年》同人，其余则都是对自家心境的概括。对“寂寞”的反复提及，固然出于鲁迅撰写该文时的心绪，彼时新文化运动高潮已过，《新青年》也转型为政党的机关刊物，昔日精诚合作的战友早已星散，或高升，或退隐，或转向，或沉默，作为继续前进者的鲁迅，难免失落与感伤。不过，“寂寞”之于鲁迅，却并非肇始于这一时期，而是其一以贯之的心境。由民国初年到“文学革命”爆发以前，在《呐喊·自序》中多有表述，自不待言；晚年定居上海，仍难以排遣寂寞之感，称自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是一本有着寂寞的运命的书”，^①可见一斑。这一心境使鲁迅即使面对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也大体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新青年》创刊已近3年，迁至北京也1年有余，鲁迅仍只是作为一个读者，不曾参与撰稿和编务，直到老朋友钱玄同约稿，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②才一发而不可收，逐渐奠定了新文学的创作实绩。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在《新青年》上的初次亮相，用他的话说，是“听将令”的产物。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青年》编者“为将”，自甘为“卒”，不将自家视作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这一表述极有分寸，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见《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② 后有研究者发现，陈衡哲的短篇小说《一日》发表于1917年6月的《留美学生季报》，时间早于《狂人日记》近一年，以此动摇后者的开创地位。这固然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源于一些学者，尤其是海外学者反感事事“由鲁迅大师开创”的研究思路。事实上，陈衡哲的这篇小说是否一经刊出即在中国国内传播并产生反响，尚无史料可证，因此即便《一日》的创作和发表时间均早于《狂人日记》，它毕竟最初流传于海外，无法和刊载于国内且“立竿见影”的后者相提并论，遑论二者艺术水平之差距。有心的研究者今后仍有可能在边边角角的史料中找到发表时间早于《狂人日记》的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但从传播角度而言，《狂人日记》作为“第一篇”的历史地位当之无愧，不可动摇。

也确实体现出鲁迅的自我定位。《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孔乙己》《药》《风波》《故乡》4篇小说。《新青年》由创刊到终止，十余年间刊登创作小说仅9篇，不及其39篇翻译小说的1/4，鲁迅的5篇占其大半，且成就之高，令余者难以望其项背。对于当时提出理论但缺少创作实绩的《新青年》同人而言，鲁迅的加入，可谓恰逢其时，而且其小说的创作水准，较之对于新文学“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等人，堪称“但开风气也为师”。鲁迅之于《新青年》，贡献颇多；但《新青年》之于鲁迅的文学事业，则更为关键。且不论“鲁迅”这一笔名就是他在发表《狂人日记》时首次采用，并成为他一生中最常使用的笔名，今人惯于以“鲁迅”称之，概源于此。而加入《新青年》的作者队伍，不仅促成文学家“鲁迅”的诞生，也开启了其创作的一个喷涌期，除上述5篇小说外，还有新诗6首，论文和杂感数十篇，后者大多收录于《坟》和《热风》这两部文集之中。这些“听将令”的产物，即便在日后被编入各类文集，为学人和读者尊奉，其价值却只有在《新青年》的视野中才能看得更加真切。尤其是《狂人日记》这篇“开山之作”，其主题设置与文体选择无不受到当时《新青年》之规约。可见，鲁迅所谓“听将令”大体符合事实，并非谦辞。

二

《新青年》杂志与晚清风行一时的《民报》《新民丛报》等相近，以宣扬思想文化为宗尚，文学作品不占主要地位，即便偶有刊载，也只是彰显杂志之“杂”，大体上仍处于“客卿”地位，而且往往是翻译压倒创作，思想意义大于文学价值。鲁迅的加入促使文学在《新青年》中地位上升，但仍不能改变其重思想之旨归。《狂人日记》的艺术技巧相对成熟，对文体的经营也颇为用心，但在研究者看来，其“格式的特别”也只能服从并服务于“表现的深切”。正如对《新青年》的研究主要建立在思想史层面，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首先也是作为一个思想文本，而不是文学文本彰显其价值。这一观照《狂人日记》的基本视角，滥觞于其早期接受史，并一直延续至今，不曾削弱，而依托于《新青年》广阔且深邃的思想史视野，才更为有效。虽然后世研究者基于所谓“纯文学”立场，或指斥《狂人日记》“思想大于形式”，缺乏小说的基本特质，或褒奖《狂人日记》小说形式的巨大意义，构成一种穿越思想的文体。但是很明显，他们讨论的其实是作为

一个独立文本的《狂人日记》，或者是收录在小说集《呐喊》中的《狂人日记》，而脱离了《新青年》在1918年时的历史语境。

作为一篇富于思想价值的小说，《狂人日记》最突出的文体特征，在于文言小序和白话日记的并存。研究者对此颇为用力，分别从“陌生化手法”（王富仁）、“对立关系”（薛毅、钱理群、王晓初）、“反讽结构”（温儒敏、旷新年、宋剑华）、“史传传统”（时世平）、“语言否定性”（文贵良）等视角切入，均有重要的理论发现。^①其中，王桂妹《白话+文言的特别格式——〈新青年〉语境中的〈狂人日记〉》^②一文从小说存在的原生态语境入手，通过考察《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文本，尤其是小说文本的基本格式“文言序言+正文”，为《狂人日记》的文体构成寻找渊源，极为有见，其结论也可以证明《狂人日记》的文体实为顺应《新青年》常例而成，的确是“听将令”的产物。不过，鲁迅对小说文体的选择，其渊源似乎不限于此。

《新青年》同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旨在除旧布新，但新旧思想文化关系复杂，头绪繁多，很难找到一个简明且有效的切入点。胡适等人于是以文学为突破口，将新旧思想文化之争化约为新旧文学之争，进而化约为文言和白话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一化约虽难免学理空疏之弊，但简单明了，切实可行，而且深谙文化论争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之道，即首先站稳自家立场，再给论争对手贴上反对者的标签，令其居于自家精心设置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中，别无选择，从而在具体的辩驳过程中得心应手、稳操胜券。以文言和白话分别

① 王富仁：《〈狂人日记〉细读》，见王富仁：《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4页；薛毅、钱理群：《〈狂人日记〉细读》，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王晓初：《两个世界的革命和对立：狂人由疯狂到康复的记录——〈狂人日记〉之我见》，载《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5~6期合刊；温儒敏、旷新年：《〈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对该小说“序”在全篇中结构意义的探讨》，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8期；宋剑华：《狂人的“病愈”与鲁迅的“绝望”——〈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与文本释义》，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10期；时世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与史传传统》，载《江汉论坛》2010年第9期；文贵良：《语言否定性与〈狂人日记〉的诞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8期。

② 载《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代表不同的思想文化立场，再诉诸是非善恶的价值评判。由此，新与旧之争被悄然置换为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对与错、善与恶，甚至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于二元中或取或弃，其倾向性不言而喻。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设置的两套文本系统——文言小序和白话日记——亦可作如是观：文言和白话的对立，隐含着对于新旧价值的不同取舍。这一文体形态及其背后的价值立场，既顺应了《新青年》同人的理念，又使小说获得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和广阔的阐释空间。

三

《新青年》倡导白话之初，其理论文章的拟想读者毫无疑问是各类文人，倡导者们期待与后者的辩驳切磋，因此必须采用文言。所谓与同行对话用文言，对下层启蒙用白话，这一话语策略和晚清白话文运动一脉相承。旨在宣扬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名作均以文言写就，也暴露出新文化倡导者的尴尬与无奈——若以白话著文，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关注，陷入没有人支持也没有人反对的“无物之阵”——日后刘半农不惜采用“海派”手段，与同样敢想敢干的钱玄同合演“双簧信”，也源于此，但因此引发同人非议，则有些出乎两人的意料。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白话文日益深入人心，这一状况开始得到改善，《新青年》同人的信心也日渐增强。1918年年初，《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开始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至同年5月出版的第4卷第5号全部使用白话。《狂人日记》恰好在这一期刊出，借助“文言小序+白话日记”的结构模式，既彰显文白对立的理念，又折射出新文化倡导者曾经的尴尬与无奈。

《狂人日记》采用《新青年》发表小说（包括翻译小说）常见的文体形式，却又明显呈现出一种“非典型”结构（王桂妹语），即小序并非日记以外的独立存在，缺少小序会造成文本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流失。事实上，这类叙述者发现某人手稿，经过处理加以披露的小说结构模式，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如《红楼梦》中空空道人抄录石头上的文字，再由曹雪芹先生批阅增删成书。在西方的冒险小说中，这一模式则更为常见。相比之下，《狂人日记》的结构模式更为独特，小序和日记之间的对话与对立关系，是绝大多数同类文本所不具备的。文言小序和白话日记代表两种彼此不能相容的思想文化立场，“狂人”徘徊两间，“发狂”时成为独异的个人，以白话承载



其惊世骇俗的思想，“病愈”后则回归众人，用文言表达对昔日言行的追悔。小说中的众人（包括病愈后的“狂人”自己）形成对“狂人”的围剿；小序虽短，却也构成对日记的包围，甚至居高临下的俯瞰。小序中的“余”公开发表部分日记，意在“供医家研究”，亦不免“奇文共欣赏”的企图。这与早期白话文创作（特别是新诗）的遭遇别无二致——被视为“奇观”，遭到反对者的轻视与嘲笑。但颇为有趣的是，刊载《狂人日记》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已全部改用白话，这就使文言小序显得特别突兀，其文本价值也因此得到了尴尬的凸显——构成“奇观”效果的不再是白话日记，反而是文言小序。将“文言+白话”的《狂人日记》发表于全部使用白话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使文言小序在诸多白话文的包围中“示众”。这是出于编者的刻意所为，还是因为鲁迅的投稿恰逢其时，尚难以得知。但在《新青年》同人苦于缺少创作实绩，颇感“寂寞”之时，“听将令”的鲁迅适时加入，的确使“文学革命”的诸多理想得以落实。

鲁迅的加入，排遣了《新青年》同人的“寂寞”，但自家是否因此摆脱“寂寞”，由消极转向积极呢？《呐喊·自序》中说，因为主将不主张消极，所以在创作小说时不恤用了“曲笔”。所谓“曲笔”，即在悲伤压抑的整体氛围中增添几笔亮色，尤见于小说结尾处，以顺应“文学革命”的乐观情绪。鲁迅自述曾将“曲笔”用于小说《药》和《明天》（发表于《新潮》）之中，并未提及《狂人日记》。事实上，“曲笔”在《狂人日记》中也有所体现，即最后一则日记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作为小说的“结尾”，“救救孩子”的呼声振聋发聩，在当时引起巨大共鸣，自不待言；而几十年后，当代作家刘心武在其小说《班主任》结尾处发出同一呐喊，足见其仍流风未散，余韵不衰，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然而，鲁迅在“救救孩子”后面使用省略号而不是感叹号，仍然令人浮想联翩。从时间上看，小序中的情节发生在日记之后，此时已病愈（或曰被治愈）的“狂人”赴某地任候补官，并将自己患病期间所作日记题名《狂人日记》，颇有往事不堪回首的追悔之感。日记在前，小序在后，日记为因，小序为果。由此可见，小说的真正结尾并不是“救救孩子”，而是小序中的情节，只不过隐含于文言之中，又置于日记之前，不易察觉。鲁迅寄希望于未来，呼唤“救救孩子”是实，这促使他为《新青年》撰稿，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同气相求。但鲁迅对于新文化的前景，从未有过《新青年》同人的乐观与坚定。这体现出鲁迅对进化论的态度。进化论于20世纪初经严复译介进入中国，影响了几

代知识分子。其中鲁迅由最初信奉到渐生怀疑，胡适则践行终生（改名适、字适之即源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胡适将进化论简化为新胜于旧并最终取代旧的线性规律，这一“越来越好”的思维模式，颇适用于新文化运动的除旧布新，并为“文学革命”的合法化提供了理论依据。鲁迅则有所不同，他曾受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接受过进化论，但又蒙乃师章太炎“俱分进化”说之指引，认定进化中有反复、有倒行，对线性模式颇有怀疑。对鲁迅而言，旧之后未必是新，新也未必能够取代旧。即便在《狂人日记》中将文言与白话相并置，他也没有将二者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更近乎视为“或此或彼”的关系——新可能是旧的产物，旧也可能是新的终结——“狂人”即如此。加上鲁迅的悲观心态，认定自家经历过旧时代，本身具有“原罪”（吃过人），对新文化的价值和自家之于新文化的意义也就颇有保留。

事实上，鲁迅对《新青年》同人这一新文化群体还是充满感情的，否则也不会在《呐喊·自序》中如此感伤。鲁迅晚年追忆昔日诸友，仍时时流露出深切的怀念之情。借助小说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之时，自家的“寂寞”却无以排遣。“狂人”在小说文言小序中的结局，似乎预告了《新青年》同人和鲁迅自己的未来，这再一次印证了鲁迅那不出己愿的深刻，也增添了他“寂寞”的虚无感。

论鲁迅钞古碑与教育部职务之关系*

鲁迅博物馆 陈 洁

1912~1917年这一时期在鲁迅日记中留下了简洁的史实记载。在鲁迅自述创作历程的《呐喊·自序》中，对这些年的追忆只用了寥寥数语：“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她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①许多年来，鲁迅便寓在S会馆里钞古碑。

在S会馆“钞古碑”这一场景，因为鲁迅的叙述，构成学界对鲁迅绍兴会馆时期（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想象的基础。^②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6期。

①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② 从1912年5月6日至1919年11月21日，大约七年半，鲁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1916年5月6日以前住在绍兴会馆中的藤花馆，5月6日以后住在会馆中的补树书屋）。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①

钞古碑是一个概要的说法。《鲁迅全集》对钞古碑专门做过一个说明：

“钞古碑 作者寓居绍兴会馆时，在教育部任职，常于公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有《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名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②这个解释简略概括了鲁迅公余钞古碑的活动。鲁迅对于金石学的兴趣，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在绍兴会馆时期，又特别致力于此。有研究者述及鲁迅曾想编纂一部六朝碑拓文字集成，因此编写了《六朝墓名目录》《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③据现存鲁迅辑录金石目录可知，《六朝墓志目录》是《六朝墓名目录》的前身。^④此外，鲁迅辑录的金石目录仅现存的就还有《汉画像目录》《唐造象目录》《嘉祥杂画像》等，并抄写《百砖考》《汉石存目》《四川通志等书金石录摘抄》等。^⑤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绍兴会馆时期为鲁迅文学的潜伏、准备、孕育期；鲁迅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精力用于钞古碑、辑校古籍、读佛经，因此这七年被划入“十年沉默期”。鲁迅为何在这一时期致力于钞古碑？目前学界普遍依照周作人的解释，将之视为鲁迅的韬晦策略。鲁迅为什么要钞古碑，收集碑

①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② 同上书，第443页。

③ 萧振鸣：《鲁迅美术年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以上4件手稿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六朝墓志目录》首页写有：“《六朝墓志目录》经修改增删，写成《六朝墓名目录》”。

⑤ 鲁迅手稿《汉画像目录》《嘉祥杂画像》《百砖考》《汉石存目》《四川通志等书金石录摘抄》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拓画像？真的如他所说是“没有什么意思”吗？周作人专门写有《抄碑的目的》做出解释：在袁世凯复辟时期，“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①因此，钞录古碑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凯的狗腿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会顾问政治的”。^②周作人对鲁迅钞碑的目的解释只揭示了鲁迅钞古碑的社会历史背景。

鲁迅钞古碑的动机还有更具体、更深层的原因。首先，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一点是，古碑与鲁迅在教育部的的工作直接相关。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职务的首项就是“博物馆图书馆事项”，^③又有“五 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博物馆、图书馆在现代中国是新兴事务。“欧美考古学的资料多数归博物馆与公共团体所有。”^④“博物馆与遗物的保存有密接关系，更兼有研究与教育两种意义。”^⑤鲁迅写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的“播布美术之方”就包括保存碑碣、壁画及造像。因此，鲁迅的钞古碑并没有陷入个人爱好的狭小空间，也并非仅仅是韬晦策略的消极状态。

学界忽视鲁迅钞古碑与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学界长期忽视了鲁迅在教育部的的工作实绩以及鲁迅与教育部同事的交往，而这些史实在鲁迅日记中有清晰的记载。

征集金石拓片本身即属教育部的工作之一。1916年10月15日，教育部在《晨钟报》登出启事征集全国金石拓本。

京师图书馆以历代金石拓本流转于民间者实为不尠，若不搜集保藏，势必散失，殊为可惜，昨已呈经教育部咨行各省征集全国金石拓本送交图书馆

① 周作人：《抄碑的目的》，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② 同上书，第155页。

③ 参见《教育部分科规程》“第四条 社会教育司置第一科第二科分掌各项事务”，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六册）》，于1913年7月由当时的教育部编纂处印行，“法令”第24~25页。

④ [日]滨田耕作著，俞剑华译：《考古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国难后第一版，第63页。

⑤ 同上书，第100页。